

论南昌的五四运动

●李健

(江西司法学校,南昌 330013)

摘要: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江西,南昌学界商界纷起响应。青年学生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江西督军陈光远逼于形势又顾及自身利益,对这次运动采取了同情支持和镇压相结合的两面政策。

关键词:五四运动;青年学生;南昌商界;江西督军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0)01—0056—03

一九一九年,神州大地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发端于北京,迅速地扩展到了全国各地。

“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南昌后,五月七日南昌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的学生首先行动,由他们发起在百花洲沈文肃公祠,召开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大会,议决:1、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2、各校迅速组织学生自治会,全市组成学生联合会;3、发动社会各界举行罢工、罢市、并筹备示威大游行,以此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①这次学生代表大会揭开了南昌“五四”运动的序幕。

五月十二日,南昌十七所学校五千余学生在市内主要街道举行爱国示威游行,他们沿途散发传单,高举写有“力争青岛”、“誓杀国贼”、“同胞速醒”、“舍生救国”等内容的旗帜,前往省议会、军署、省署请愿,要求当局通电声援北京学生,反对和约签字。并约定“自今日起各校学生不用日货,并由各学生随意劝亲友提倡国货。”^②

接着南昌各界也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十日,省教育会、省农会两次向北京政府发出通电,力促政府收回青岛和释放被捕学生。同一天,南昌总商会致电北京,提出“青岛归日管理,誓不承认”,要求“开释学生,以平公愤”。^③接着向全省各县、镇商会发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呼吁。在各界群众日益高涨的爱国运动的激励下,江西督军陈光远发出致大总统、国务总理电,表示反对和约签字,力主收回青岛;接着又发出致全国各省督军电,呼吁停止内战,共御外侮。

上海“三罢”斗争实现后,南昌学生联合会在六月四日召开会议,讨论响应京沪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六三”大捕学生的罢课行动,决定六日举行罢课宣誓。南昌总商会于十一日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惩办国贼,保全学生,以快人心。”^④南昌学生再次集会,宣誓罢课,声援北京学生。江西省长戚扬、督军陈光远起先严令禁止学生行动,但迫于江西各界人民压力,致电北京总统府,转陈江西人民收回青岛、保全学生、严惩卖国贼的要求。这样南昌人民的爱国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不断向前发展。

此时,江西省议会的议员不顾民族危亡和在天灾人祸逼迫下江西人民生活的痛苦,为了满足私欲,竟依仗手中掌握的权力,擅自在预算案内秘密增加议员的工资,由原来的每月八十元加到每月一百六十元。消息传开,南昌人民无不怨愤。5月31日上午,市商、学、教、农等各界在沈公祠召开反对议员加薪的国民大会,一面派

代表赴省府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员加薪一案，同时到省议会，要求议会自行撤销此案。但是议员们不仅避而不见，还指使他们的数十名轿夫，无理殴打代表。全体代表怒不可遏，当即痛打议员，砸烂了省议会。第二天，全市商界、各中小学校举行罢市、罢课。省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当天晚上宣布取消了议员加薪案。

与此同时，南昌各界展开了救助南浔铁路的运动。七月十九日，绅、商、学界联合召开南浔铁路救济会成立大会，通过了会章。南昌各界人民同时纷纷捐款，筹还日债。接着南浔铁路救济会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决定发行储蓄奖券，筹还日人借款。江西各界开展的救济南浔铁路活动，并不仅仅是争取收回江西路权，实质也是南昌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举动。当时，江西财政越来越窘迫，支绌难以应付，入不敷出。而省内一些奸商乘国难当头，囤积居奇，造成南昌市米价持续上涨；更有甚者为了捞得厚利，竟把米销往日本。南昌学联接连两次要求省长、督军禁米出口，以维民食，又向南昌总商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省财政厅却宣布开放米禁，这又激起了一次大风潮。

南昌学联在听得米谷开禁令颁布后，派代表前往军政两署请愿，要求收回成命。陈光远恼怒异常，以“不允许学生干涉内政”为借口，^⑤于十二月九日查封了学联。第二天南昌学联发表罢课宣言，表示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接着各校相继罢课。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学联、上海学联、旅京赣籍学生分别致电陈光远，要求其支持学生爱国行动，重申米禁。在此情况下，二十二日下午，督军、省长及各界代表数百人在省议会开会，军政两长当众宣布：运米出省，不准接济日本帝国主义，并可由学生调查；米价不涨，否则重申严禁。^⑥第二天，南昌学会联合会开会，决定终止罢课，并宣读了终止罢课宣言。历时两星期之久的米禁一案终于以学联与当局双方的相互“退让”而告结束。

此后，南昌各界救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反日斗争仍然蓬勃进行，为以后南昌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在南昌五四运动中，学生英勇地站在爱国运动的前列，起到了先锋作用。商界也投身于五四运动中，表现出应有的爱国精神。当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南昌以后，学界首先作出反应。正由于学生的爱国热忱，激励了各阶层的民众，唤起了民众，南昌各界纷纷投入到这场运动的洪流之中。

南昌学界在运动中注重了与各界的联系，团结各界一同进行斗争。如学联查获了洗马池中和堂药店的一批冒充国货出售的日本仁丹以及涌兴祐商号到昌的日本火柴，便先与商会、警署商议，再予以焚毁，这就照顾了商会的颜面，使反日斗争更加有利地进行。学界还不辞辛劳，往来于全省各界、各团体中奔走，呼吁成立各界联合会。各界由此深感钦佩，纷纷加入，遂成立了江西各界联合会，使全省爱国运动达到新的高潮。有了各界的联合支持，学生运动也更加有力，不断向前发展。

在运动中学生斗争坚决，不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南昌学界表示“头可断，血可流，而国家之领土不可损失，国家之主权不可放弃。”^⑦省立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学生程孝芬，激于该校校长金振声阻遏学生参加运动的义愤，断指血书“提倡国货，用日货就是冷血动物”十余字，^⑧以表达自己的爱国决心，鼓舞全省人民的爱国热情，全省各界民众因之大为感动。在反对省议员加薪斗争中，学联决定“如公民团不实行警告，本会即取单独行动，以达取消加薪目的，如一日不得圆满答复，同人等即一日不退出该会。”^⑨当省议员大打出手时，学生们愤而上前，痛打议员，砸烂了省议会。在禁米运动中，学联坚持了长久的罢课，不受威胁利诱，提出必须“保障言论、结社自由和弛放米禁须保不涨价、不资敌，运往外省须通知学联”等为复课条件^⑩，表达了决不妥协、斗争到底的决心。

总之，南昌青年学生在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爱国热情、先锋模范作用以及英勇不屈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当代青年敬仰和学习。南昌历史上这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出后，南昌总商会除了致电北京政府力争外，还议决“劝告国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牺牲贩运之权利”^⑪。上海“三罢”实现后，南昌总商会即向北京致电，要求“惩办国贼，保全学生”^⑫。当学生进行爱国游行，“经过洗马池”，各商店无不表示一种爱敬之态度，有福慎祥烟店高悬旗帜于门首，上书‘诸君劳矣，请吃茶去’，又陈设一茶几具于门首^⑬。在学联活动经费出现困难时，商会慷慨解囊。对于学联查获奸商贩运的日货，总商会毫不犹豫地同意，由学联自行处理。可见商界的举动对势单力孤的学生运动，

无疑是起了极大的鼓舞与支持作用，使学界的爱国斗争更加有力。在反对省议员的加薪斗争中，商界配合学界的罢课，进行罢市，迫使省当局取消了议员的加薪一案。特别是在米禁斗争中，学界和当局相持不下的最后关头，总商会与省议会、教育厅一道出来作为调解人，促使了米禁问题的妥善解决。

但是，商人毕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一身而二任焉”。运动一开始，南昌总商会就表现出了软弱性，不少商人在抵制日货中赚了钱、发了财。某些奸商还私运日货和把日货冒充国货出售，牟取暴利。在禁米运动中，总商会先是反对弛禁，但在省当局宣布弛禁办法后，迫于压力便又同意弛禁。这些都是商界软弱性、妥协性的表现，这是其本身无法克服的弱点。

三

在南昌的五四运动中，直系军阀、江西督军陈光远扮演了一个两面性的角色，对学生运动采取了同情、支持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是何原因促使他采取这种政策呢？

首先，北洋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了陈光远的决策。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分别得到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其中以英日矛盾最为尖锐。为了控制中国，双方展开了明争暗斗。而军阀是看其外国主子的眼色来行事的，它们又都希望削弱对方，壮大自己势力。由于“五四”运动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皖系军阀，这对于直系军阀来说无异于天赐良机，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看到运动对他们有益无害时，便出面帮助学生说话。他致电北京，要求“释放学生，以培养士气”，“收回青岛，以平民气”^①。可以说这为陈光远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和借鉴。

其次，当时江西的实际情况也影响了陈光远的决策。由于各种原因，江西进入近代以来，社会经济较落后，陈光远在各省督军中实力也较弱。但每个军阀（包括陈光远）没有不想扩充自己势力、巩固自己统治的。因此，当学生运动兴起后，陈光远认为反对日本、振兴江西对自己有益无害，且可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势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当五月十二日学生游行请愿后，陈光远即与省长戚扬联衔致电北京代转民意，要求严拒签字，对学生“勿过摧残”。对于议员加薪案，陈光远认为反对议员加薪的领导者大多为江西各界商、绅界名流、各校校长、学生，得罪了他们无疑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因此下令取消议员加薪，对此案中发生的风潮也不了了之。当江西各界掀起提倡国货、置办实业热潮，开展收回南浔铁路运动后，陈光远认为这对振兴江西经济、提高自己实力有利，因而表示支持，并担任了南浔铁路救济会名誉会长。

然而，陈光远毕竟是封建军阀统治者，如果触犯了他的利益，他便会采取报复、镇压措施。而且，北京政府还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陈光远也怕落个“不执行中央命令”的罪名。当他得知学生因为青岛问题将于六月六日举行宣誓罢课后，立即派军警弹压，使学生的计划告吹。接着又布告安民，声明“如敢有借词集会，聚众演说者，即着该管军警实行制止，倘有不服制止及煽惑人心者，立于依法逮捕，毋稍宽纵。”^②。当学生反对米谷弛禁，危及到陈光远的切身利益时，他一方面召集各校长，“请戒学生勿干预此事，如聚众来署，必以武力干涉，勿怪不情”。另一方面又派出军警将南昌学联强行封闭，做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这是陈光远镇压、反动的方面。

总之，陈光远在运动中既有同情和支持，又有镇压行为，而前者多于后者。从当时全国来看，在北京、福建、陕西、湖南等地，封建军阀统治者对学生运动进行了较严厉的镇压，甚至还杀害了学生。相比之下，江西情况缓和许多，陈光远的态度客观上有利于江西学生运动的发展，为江西学生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但也应看到，陈光远所提供的条件是有选择性、有限的，如果触犯了他的利益，其封建军阀统治者镇压的本性，很快就暴露无遗。

注：

①：《南昌青年运动三十年》（1919年—1949年）第3页。

②③④⑧⑨⑩⑪⑫⑬：《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5月15日、6月16日、6月16日、5月23日、6月3日、12月18日、6月16日、12月13日。

⑤⑥⑦⑪⑭⑮：《早报》1919年12月16日、12月29日、9月9日、12月29日、5月19日、12月13日、6月11日。

（责任编辑：陈希实）